

赫塔·米勒《呼吸秋千》的文化记忆

邵凌玮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23)

摘要: 文学作品被普遍当作一种记忆的媒介,它既是个体记忆的媒介,同时也是集体记忆的媒介。以2009年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长篇小说《呼吸秋千》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乡愁、饥饿和劳动营这三重个人记忆,指出小说将个体记忆纳入民族文化记忆的框架之中,对构建集体记忆发挥了作用。

关键词: 赫塔·米勒;《呼吸秋千》;饥饿;劳动营;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 I106; I516.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6)02-0106-06

Cultural memories in Herta Müller's *Atemschaukel*

SHAO Ling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Works of literature help produce cultural memories. The function of the work as media has a constructive role in shaping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dividual memory reflected in *Atemschaukel* (*Hunger Angel*), a novel by 2009 Nobel Prize winner Herta Müller,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homesickness, chronic hunger as well as life in the labor camp. It also focuses on the outcome that how this novel influences the collective memory.

Keywords: Herta Müller; *Atemschaukel* (*Hunger Angel*); hunger; labor camp; collective memory

文学从来都和回忆密切相关。在文学创作中,回忆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1]6}。文学回忆基于个人回忆,往往被放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影响到生活在相同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他人,并作用于当下的社会集体记忆。正如阿斯特莉·埃尔(Astrid Erll)所言,文学作品既是个体记忆的媒介,同时也是集体记忆的媒介^{[2]229}。

在1945年以来的德国文学中,对二战及大屠杀历史的回忆是一个常见主题。德国知识分子和作家通过多样的文学形式,再现、反思和检讨二战及大屠杀的罪责,构成了战后文学史中特殊的记忆文化,并

收稿日期: 2015-07-10

作者简介: 邵凌玮(1989—),女,浙江省杭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跨文化及身份认同研究。

使之成为二战结束至今社会集体记忆中的主线^[1,3]。

2009年3月,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吸秋千》(Atemschaukel)就是一部基于他人口述回忆的文学作品。小说从一个17岁男孩的视角书写了乌克兰劳动营中的记忆。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时,主人公雷奥被押往苏联,从此经历了5年地狱般的劳动营生活。小说的原型是罗马尼亚籍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Oskar Pastior)。2001年,米勒开始着手采访幸存的被流放者。曾在苏联劳动营流放了5年的作家奥斯卡通过他的回忆,帮助米勒完成了小说。2009年,米勒因为《呼吸秋千》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评价道:“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本文以《呼吸秋千》为例,探讨小说中的三重个人记忆,以及与集体记忆的联系。

1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构建

记忆媒介的形式有很多种。除了图像之外,文字也是一种常见的媒介形式。其中,作为文本的文学是一种最为广泛的文字流传形式^{[1]72}。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种体裁和类型,都被普遍当作一种记忆的媒介,对个人及集体记忆的构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文学是表现个体记忆的一种形式。个人记忆运用叙述结构构建传记文本^{[1]105}。对表达个人亲身经历来说,“叙事”功能至关重要。个人的实际经历往往是零散的、复杂的甚至模糊不清的,只有通过叙述的方式,才能把脑海中杂乱无章的事件重新排列理顺,使之条理化和清晰化^[4]。

其次,文学作品是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汇点。集体记忆的概念起初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它是一个群体中诸多个体记忆在对话、交往中构建的。因此,个人的回忆通过媒介的再现和分配到达集体的层面,从而进入集体记忆的框架之中,对集体同一性发挥构建作用^{[2]245}。

在记忆文化的语境中,文学作品可以满足两个基本功能:记忆形成和记忆反思。借助对现实和过去的叙述,文学作品积极地参与记忆文化的形成^{[2]242}。文学作品融合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并通过艺术的方式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个体,从中呈现出积淀的集体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小说中的个体于是就获得了对于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类型”意义^{[1]106}。正如冯亚琳指出的,文本本身有可能被逐渐遗忘,但它所传达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却会经过沉淀,进入民族的文化记忆^{[1]65}。此外,作为记忆反思的媒介,文学作品在对历史重新构建的同时,也对现实有着批判反思的功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加或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及“大屠杀”的幸存者日渐步入老年。然而,以文学承载历史记忆的趋势并没有因为二战亲历者的逝去而淡化,反而在德国文坛上有增无减。以亲身经历过纳粹时期的第一代人的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为例,他创作的小说都与记忆有关。出版于2006年的自传回忆录《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更因为揭露了他在青年时期曾效力于纳粹党卫队而震动整个世界文坛。而第二代人,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或后期出生的一代德国人,与第一代人在回忆中追问罪责不同,他们的回忆在于通过重构或反思父兄辈的过去^{[1]286}。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发表于1995年的小说《朗读者》(Der Vorleser),通过一段爱情故事表现了第二代人对第三帝国这段历史的复杂情感。

随着第一代人的陆续缺席,回忆不仅成为必要,也成为必然。昔日的口头回忆或是自我记录逐渐转换为他人记录或是他人整理。作为第二代人的德国作家乌韦·蒂姆(Uwe Timm),出版了小说《以我哥哥为例》(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主人公整理和研究了哥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留下的日记和书信,试图通过这一过程重新唤醒记忆,建立一个有良知并勇于承担家族乃至民族罪责的德国人身份^[3,5]。

米勒的创作以本人经历或者真实的历史材料为素材,关注主流德语文学叙事中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群

体,描述了齐奥塞斯库极权统治下的芸芸众生的生活。正如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哈特穆特·艾格特(Hartmut Eggert)所说:“文学的一个功能是承载文化记忆,她书写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如果不是被写进小说,可能就会被修正过的历史书写忘记了”^[6]。

2 《呼吸秋千》中的个人记忆

《呼吸秋千》故事背景设定于“二战”结束时,17岁的男孩雷奥被送到乌克兰劳动营,在劳动改造中受尽非人的待遇。和米勒的母亲一样,帕斯提奥在17岁时遭到流放。对于所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而言,流放这个话题被视为禁忌。只有在家里,或是和也有过流放经历的很熟的人之间,才会谈起在劳动营的岁月。即使谈论,也只是暗示而已^{[7]277}。帕斯提奥为米勒提供了关于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并且与米勒一同参观了今日乌克兰境内的劳动营。2006年帕斯提奥突然离世。一年之后,米勒根据帕斯提奥提供的关于劳动营的细节,独立完成了这部小说。

尽管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帕斯提奥在劳动营的经历,并非作者米勒本人的记忆,但是米勒采用了第一人称的个人叙事模式。主人公从自身出发,讲述了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自己和周围人的故事,描述了一种“个人化”的历史记忆^[8]。

2.1 家与记忆

5年的劳动营经历也是雷奥被家放逐的过程。当小说的主人公雷奥坐上去往苏联的火车时,他并不知道被押往苏联意味着什么,他丝毫没有感觉到恐惧,他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他原本生活的小镇,“17岁的我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只要能离开家,只要将来情况不会变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7]2}。

然而,当他真正开始在劳动营里地狱般的生活的时候,想离开家的念头逐渐转换成了想回家。乡愁成了他在劳动营里魂牵梦绕的一种情感。“乡愁在有些人那里被诉说着,被歌唱着,被沉默着。走着的时候有乡愁,坐着的时候有乡愁,睡着的时候有乡愁”^{[7]213}。劳动营阻断了他们与家里的一切联系,“我们不准往家里写信,家人无从得知我们的生死”^{[7]70}。于是,临别时祖母说的那句“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成了雷奥在劳动营里的一种感情支撑。他“天天想着回家,却永远回不了家”^{[7]28}。

随着时间的流逝,雷奥的思乡情绪也逐渐淡化。乡愁变得空洞了,“因为它和实实在在的家已毫不相干”^{[7]213}。雷奥虽然想回家,但是这个念头只停留在对过去的回忆上。在劳动营里,雷奥想起过无数个过往在家乡的场景。比如小时候,妈妈和费妮姑姑喝咖啡时,他跑过花园,生平第一次看到一只肥硕成熟的草莓;比如离家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在饭桌上,母亲说,别用叉子戳土豆。他早就教会了他的乡愁不去哭泣,“我越想回家,就越试图不使它变得强烈,以免再也无法回家时,不至于整个人都垮掉”^{[7]183}。

直到有一天,雷奥在劳动营里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家里来的邮件。那是他母亲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用白线钉了一张孩子的照片,照片下方写着:“罗伯特,1947 4月17生”^{[7]196}。这个时候,雷奥突然明白过来,他的父母已经添了一个孩子来取代他。雷奥感到了被冷落,他不再被家人需要。他在家里的位置已经被这个新生儿多代替。家里已经无人等他回去,他也从此无家可归了。他成了个“土豆人”,“在黑夜中形影相吊,把回营的路视为归家的路”^{[7]183}。

1950年初,当雷奥从劳动营里放出来时,他已经完全无法适应家庭生活,而家也无法适应他。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家人,都已经与过去不同,也无法回到过去。“回乡七年后,我已经七年没有过乡愁了”^{[7]212}。对于雷奥而言,这种乡愁是实体上的消失,他已经回到家乡,便不再有乡愁了;同时也是心理上的消失,因为家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小说中,雷奥对于家的情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化:从最初离开家时的心甘情愿,到劳动营里的乡愁,直到收到母亲来信时的心灰意冷,再到回乡之后家的陌生感。雷奥在回家后分析道:“在营地,一个人对于家乡的眷恋被消磨掉了。人们不必做也不愿做任何决定。人们虽然想回家,但只是让这个念头停留在过去的回忆上,而不敢让这种渴望去面对未来”^{[7]240}。

《呼吸秋千》构建了雷奥对家的个体记忆。被运送到劳动营前,家是真实的存在。然而从雷奥离开家的那一刻起,他便再也回不去了。家脱离了实体,成为了他的一种记忆。家是他脑海中存留的无数个与家人共处的画面,也是他身上带着的一个个具体的物件。

2.2 饥饿与记忆

在5年的劳动营岁月里,饥饿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饥饿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于是,在《呼吸秋千》这部小说里,米勒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饥饿。

对于经历过劳动营的人来说,饥饿成为了一种无法逃避的疾病。米勒称之为“慢性饥饿病”,并且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有一种饥饿,会把你的饥饿变成病态。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到原有的饥饿之中。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跃入旧的、永恒的、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如果除了谈饿之外,关于自己就无话可说,如果除了饿之外,别的事都无法去想,那么人该如何在这世上生存?饥饿让人无法忍受时,硬腭内就会抽着痛,好像有人把一张刚剥下来的兔皮在脸后撑开了去晒干,脸颊变得干枯,覆盖着苍白的茸毛”^{[7]19}。

饥饿这种病态,不但在人的身体中蔓延,成为生理上的疾病,而且根植在人的思维中,成了心理疾病。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饥饿都萦绕心头。劳动营的人们白天聊吃的,做着白日梦,夜晚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做着吃的梦。“我吃完一个短梦,然后醒来,继续吃下一个短梦。所有的梦都一样,都是在吃东西”^{[7]79}。米勒运用了她擅长的对物的列举的写法,详尽叙述了梦见过的各种食物,“我吃着面包和婚宴的汤,吃着带馅的辣椒、面包和塔形蛋糕。然后我醒了,看了看工棚里昏暗的灯光,接着又睡了,喝着紫甘蓝汤,吃着面包、腌兔肉和面包,还有银杯中的草莓冰淇淋。之后,我又吃了坚果面条和新月形小面包。接着,吃了克劳森堡泡菜杂烩和面包,朗姆酒蛋糕。然后还吃了猪头肉、辣根和面包。最后我几乎吃了孢子腿、面包和杏子蜜饯”^{[7]79}。长长的清单看似冗长累赘,却体现出每一样食物在记忆中是那么清晰,梦中出现的是人脑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

闲聊或是做梦的时候,食物的样子或是滋味越详细,人们就会越幸福。可惜,等回到现实的时候,落差也就越大,人们就会越痛苦。这种吃饱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只出现在人们的回忆和梦境里,现实中只剩下填不饱肚子的面包和永远的饥饿。反差越大,对食物的记忆就越深刻,对梦境的依赖也就越大,直至无底深渊,无法自拔。“梦里的吃喝强迫症是恩惠,也是折磨”,“梦里吃得越多,睡眠越浅,饥饿永远不知疲惫”^{[7]79}。

小说的最大特点,便是米勒创造的“饥饿天使”的形象。“饥饿天使”在《呼吸秋千》里贯穿始终,出现在各种章节里:麦得草、水泥、石灰妇女、心铲、煤、土豆人、白兔等。借用“饥饿天使”,米勒传递了一种对死亡的恐惧。“饥饿”通向死亡,而“饥饿天使”接近于“死亡天使”,时刻威胁着劳动营的人们。在死亡的威胁下,饥饿起到了一种双重作用^{[9]60}。它预示着即将被饿死的危险,同时又时刻提醒人们,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赶快找吃的。不断地有人在劳动营里死去,“每个人的死因都不同,但总有饥饿参与其中”,而“我从未像在劳动营的5年里那样坚决地抗拒过死亡”^{[7]80}。死亡的威胁以饥饿的形式出现,如影随形,然而,人只要还知道饥饿,就说明还活着,还有生的希望^{[9]60}。当饥饿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的时候,“吃”是最有力的反抗。对于小说主人公雷奥来说,“吃”变成了尊严并且幸福的一件事情。“饥饿”与“吃”这种对抗的关系,不断出现在小说中:“饥饿最为难耐的时候,我们就聊童年和吃的”“每个饥饿词就是一个吃喝词,吃的样子浮现在眼前,味道缠绵在嘴里”“我和世界的关系就是吃”“我如此爱吃,是因为我不想死,因为死了就再也不能吃了”^{[7]228}。

饥饿成了一种创伤,给活着走出劳动营的人留下了余生的饥饿后遗症。当空间对换之后,在劳动营里魂牵梦绕的乡愁也转变成了回乡之后对劳动营的饥饿记忆。

2.3 劳动营与记忆

《呼吸秋千》的一大主题便是“记忆”对遭受创伤的人反复进行的折磨。回乡之后,对于劳动营的回忆成为一种被动的行为^{[9]61}。人们从来不曾主动回忆,营地里生活的场景总是会不自觉地出现在脑海中。

在《麦得草》一章,米勒借用雷奥的口吻写道:“劳动营的事务并非一个接一个,而是成群地、一古脑儿地来突袭我。因此我知道,它们并不是来唤起我的回忆,而是为了来折磨我。”^{[7]28}

在小说中,米勒借用了“行李箱”的隐喻,指向了主人公雷奥漂泊无依的命运。当他离家去劳动营时,他带上了一只改装的行李箱,而从劳动营里回来时,他又打了一个新的木箱,放在床下。60年过去了,雷奥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家乡,陪伴他的只有行李箱。对于雷奥,行李箱成了他最重要的物件,装载着他所有的记忆。

此外,通过“行李箱”的隐喻,米勒突出了物在雷奥记忆中的重要性。物超越了人,成为他多年之后回首往事时让他记忆最深刻的东西。当乡愁被雷奥抛弃,他的头脑里不再有家人的存在,“只剩下一些物品”。而劳动营这个沉重的记忆包袱也成为了“行李箱内的东西”。行李箱总是和黑夜联系在一起,“60年来,我想要在夜里回忆起劳动营的事物。它们就是我夜晚行李箱内的东西”^{[7]28};“从劳动营归乡之后,无眠之夜就是一只黑皮行李箱。这箱子就存在我脑海之中”^{[7]28}。“黑色行李箱”又形象地表现了劳动营的记忆像一个黑暗的封闭空间^{[9]61}。人们被禁闭在这个空间内,无法逃脱,生活只剩下黑暗,看不到光明。行李箱和行李箱内的物品替代了雷奥生活中熟知的人,连接了他与过去。

《呼吸秋千》主人公的原型,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尔对劳动营的个人记忆通过他的口述,米勒的记录,写进了小说里。而小说中,当雷奥返乡之后,他也开始整理劳动营的记忆,“我开始在听写本上写作”,“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扩展了‘前言’,整整写了三个本子”^{[7]261}。写作,即回忆的过程,是漫长又痛苦的,“我后来经常琢磨这句话。我把它写在一张空白纸上。第二天给划掉了。第三天又写在了下面。然后又给划掉,继而再写上去。那页写满的时候,我就把它撕了下来。这就是回忆”^{[7]262}。连雷奥自己都感叹,“我是一个伪见证人”。在他记录的过程中,他舍去或是改编了很多情节,“我没有提到祖母的那句话:我知道你会回来的,也没有提到那方细亚麻布手帕和带来健康的牛奶,而我却像欢庆胜利似的,连篇累牍地描绘着自己的面包和脸颊面包。然后是我在和地平线及土路进行拯救交换时的毅力。描写饥饿天使时,我进入了一种迷恋的状态,似乎它不曾折磨我,而是拯救了我”^{[7]262}。

帕斯提尔对劳动营的个人记忆为《呼吸秋千》提供了素材。小说基于帕斯提尔的回忆加上米勒的创作,成为了一部虚实结合的作品。而小说里,当雷奥开始对劳动营进行回忆的时候,他在听写本上的写作又揉杂了真实与虚构。这样多重虚实结合,更为生动地体现了从劳动营回来的个体的伤痛记忆。米勒在小说中很好地总结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的复杂情绪:“当劳动营的一切重回心头时,‘重回’一词显得苍白无力。另一个苍白的词是‘回忆’。这样的重回也不需要‘创伤’这个词。还有‘经历’这个词。对付这些苍白的词时,我必须装傻。然而,每次和我交手之后,它们就变得愈发强烈。”^{[7]213}

3 《呼吸秋千》与集体记忆

记忆需要媒介。文学作品既是个体记忆的媒介,同时也是集体记忆的媒介。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文学回忆往往首先是个体回忆,比如自传小说、第一人称小说等。个体回忆只能发生在集体框架中。文学作品在表现个体回忆的同时,往往会将这一回忆放到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其二,文学回忆作为记忆的一种媒介,能够作用于当下。它通过自己的选择方式去影响特定社会的集体记忆^{[1]76}。文学作品将个体记忆纳入民族文化记忆的框架之中,对个中反映出的价值体系、特征、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反思和关照,从而对于集体和民族同一性发挥构建作用^{[2]245}。

尽管米勒在《呼吸秋千》中叙述的不是她本人的故事,但是她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构建了一种个人化的时代记忆。小说中,思乡、饥饿和劳动营这三重个人记忆占据了雷奥,这亦是亲历者帕斯提尔身心无法抹去的恐惧。米勒讲述的虽然是个体记忆,指向的却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每个个体都无法脱离他生活的时代大背景。因此,小说根据帕斯提尔的亲身经历,将他提供的细节和零碎的片段,重新构建成一个连贯的叙述。小说展现了一个人的悲惨遭遇,却呈现了几乎每一个在劳动营生活过的人的共同经历。

文学不仅承载记忆,而且铸造记忆。文学作品的媒介功能能够对读者产生影响。其传播功能甚至比

新闻和报刊更好,因为文学传播的不只是事实信息,而且更是感情、思想和人性化的体验^[10]。米勒颠覆了整体性的宏伟叙事和纵观全局的视角,既没有对当时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的历史做“宏大叙事”,也没有站在社会历史的高度描写大众的苦难^[11]。她利用自己擅长的小人物描写,通过男孩雷奥的悲惨遭遇和经历,将个人记忆织入集体之中,唤起时代的记忆。在《呼吸秋千》当中,读者能够通过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被带入那个环境,对遭遇过劳动营的人产生“感同身受”或者“就像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认同感,从而起到构建集体记忆的作用。

4 结 语

米勒的小说都跟她本人或是他人的真实经历相关。她一贯以文学为武器,通过现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创作方式,控诉黑暗年代,抵抗遗忘。《呼吸秋千》基于他人的亲身经历,经过米勒的加工创作,使小说读上去都充满文学色彩却仍然有现实的影子。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来展现回忆,连接不同的时间层面,使时空交错,重现60多年前劳动营的“非人”生活,让有着相同经历或者没有相同经历的读者内心感受交替或重叠,超越时间和空间,对构建集体记忆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 [1] 冯亚琳. 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2] 阿斯特莉·埃尔. 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M]. 吕欣, 译. // 冯亚琳, 阿斯特莉·埃尔.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3] 李双志. 家族史与当代德国文学的历史记忆叙述模式[J]. 当代外国文学, 2013(4): 117-125.
- [4] 陶东风. “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 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J]. 文艺研究, 2011(6): 13-24.
- [5] 刘海婷. 蒂姆《以我的哥哥为例》中的记忆问题[M] // 冯亚琳, 丰卫平, 杨欣, 等. 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94-305.
- [6] 蓑蓑. 文学奖: 她为全人类书写记忆[EB/OL]. (2009-10-13)[2015-04-21]. <http://www.lifeweek.com.cn/2009/1013/26369.shtml>.
- [7] 赫塔·米勒. 呼吸秋千[M]. 吴文权, 余杨,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8] 胡蔚. 政治·语言·家园: 赫塔·米勒的文学观[J]. 探索与争鸣, 2010(1): 70-74.
- [9] 吴文权. 论赫塔·米勒《呼吸秋千》中的超现实隐喻[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4, 25(4): 57-62.
- [10] 徐贲.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 [11] 乐萍, 熊欣. 为了抗拒遗忘的写作: 赫塔·米勒《心兽》解读[J]. 求索, 2013(3): 156-158.